



中國人民大學

學報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西方政党的数字化变革：
技术驱动下的组织重塑与动员逻辑

王 翔 李志恒

JRUCWP2026016

2026. 03. 07

-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西方政党的数字化变革： 技术驱动下的组织重塑与动员逻辑

王翔 李志恒

[摘要] 全球数字化转型正在深刻重塑着政党政治的组织模式与权力结构。西方政党的发展正从单向信息传播的初步探索，逐步迈向数据驱动的精准确动员，并走向平台化与智能化的治理模式。数字化浪潮改变了政党的竞选策略、选民动员和政策制定模式，使其通过数据驱动和算法支持实现了精准政治沟通与高效政策响应。然而，这一变革在提升治理绩效的同时，也伴随着民粹主义崛起、社会极化加剧与信任危机，对西方政党合法性与治理结构造成了严峻挑战。未来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更具合法性和包容性的治理模式，是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关键议题。

[关键词] 西方政党；数字化；政治沟通；政治动员

一、引言

数字化浪潮的到来，深刻地推动了西方政党在政治传播、选民动员和决策机制上的变革。通过数字化技术，政党不仅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和接触选民，还能够实时跟踪民意波动，迅速调整策略与立场。^① 这样的转型打破了过去笼统、平铺式的沟通模式，促使政党进入了一个高度精准化、定制化、个性化的政治动员新阶段。同时，这一转型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公民的参与方式和民主意识，公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接收者，也不是只能在特定时刻投票的大多数，^② 数字化时代赋予了公民更加主动的参与空间。^③ 他们可以随时通过数字平台表达观点、参与辩论，甚至直接影响政策议题的形成和走向，公民的声音变得清晰而有力，成为一种持续、动态的社会性力量。^④ 当然，在信息流动更加迅速的今天，西方政党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如何平衡技术带来的高效

作者：王翔，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副教授，wangxiang@nankai.edu.cn；李志恒（通讯作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科研助理，2211023@mail.nankai.edu.cn。

* 本文系司法部2024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青年课题“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治理效能研究”（24SFB3006）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人提供了专业细致的审稿意见，在此谨表诚挚谢意。文责自负。

① T. Konitzer, et al. “Using Big Data and Algorithm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Geographically Targeted Advertising on Vote Intention: Evidence from the 2012 U. S. Presidential Elec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18, 36 (1): 1-16.

② W. L. Bennett. “Changing Citizenship in the Digital Age”. In W. L. Bennett (ed.). *Civic Life Online: Learning How Digital Media Can Engage Youth*. The MIT Press, 2008, pp. 1-24.

③ W. L. Bennett, et al. “Young Citizens and Civic Learning: Two Paradigms of Citizenship in the Digital Age”. *Citizenship Studies*, 2009, 13 (2): 105-120.

④ W. L. Bennett, and A. Segerberg.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3, 15 (5): 739-768.

与信息过载，如何处理技术与传统政治文化之间的摩擦，如何在增强公民参与的同时避免社会分裂的加剧，如何在追求精准动员的过程中避免过度操纵，这些都是数字化政党需要直面的难题。

在数字技术全面介入政治生活的当下，政党的角色边界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组织形态到传播策略，从公共表达到政策输入，政党不仅改变着自身的运作机制，也在不断调整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位置。本文所关注的“政党”，以西方国家中的主流政党为主体，既包括具备执政能力的传统大党，也涵盖借助数字平台实现快速动员的新兴力量。随着算法、社交媒体等工具逐步融入政党日常运作，治理的维度也不再局限于政党内部的结构调整，而是延伸至政党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接口与情感回路。在此过程中，政策制定既表现为执政党依据数据反馈优化治理响应的技术路径，也体现为政党在数字空间主动设定议题、争夺话语权的策略布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学者创造性提出“数字化政党”的概念框架，强调了当代西方政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①是政党在新的信息环境中对权力、组织与沟通方式的自我调适。本文正是在这样的概念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全球数字化转型对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影响。我们尤其关心：技术如何锻造西方政党权力？在此延长线上，我们的研究问题可以具体归纳为：数字化浪潮如何在组织架构、沟通机制和决策机制上塑造政党新形态？数字化技术如何重塑政党与选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数字化政党如何应对社会分裂和政治信任等合法性危机？在理论发展意义上，本文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数字时代政党政治转型的认识，也为理解技术变革与政治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数字化政党：技术逻辑下的演化机制

从政治实践的演化路径来看，数字化政党不仅仅是数字化时代政党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现代政党组织演变中的重要环节。这一大转型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与社会逻辑：一方面，技术进步为政党政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个性化动员手段；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也在重新塑造政党与选民的关系，改变了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政治沟通机制。同时，政党政治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并非当下的一种井喷式现象，而是一个渐进的历史性过程。具体而言，这种转型发端于互联网时代，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信息传递与互动探索阶段。20世纪末，互联网的迅速崛起引发了一场信息传播的革命。万维网的出现，让信息可以直接通过浏览器跨越时空边界，成为信息公开传播和获取的崭新途径。这一变革也逐步影响了政党动员选民的方式，在199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和多尔（Bob Dole）的竞选团队首次借助互联网建立了候选人网站，用以发布竞选主张和活动安排，此举成为将互联网作为政治传播工具的首次尝试。尽管彼时网站主要局限于静态上的信息传播，功能较为单一，互动性较为有限，更多充当了电子公告牌的角色。^②但这一尝试却开启了政党利用网络进行信息传播的先河，政党开始接触到更为广泛和分散的受众群体。此后，社交媒体的发展又将政党和选民之间的联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以脸书（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为政党提供了互动性更强、即时性更高的沟通工具，政党可以更加灵活地回应民意、吸引年轻选民，并建立在线社群以实现政治动员。^③直至2008年，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竞选团队成功地将这种社交媒体技术运用于选票动员。他们借助社交媒体的互动特性，通过数据分析精

^① 丁辉：《数字化政党：一个非类型学的理论框架》，载《政治学研究》，2024（1）。

^② J. Stromer-Galley, *Presidential Campaigning in the Internet 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21 - 40.

^③ G. S. Enli, and E. Skogerbo. "Personalized Campaigns in Party-Centred Politics: Twitter and Facebook as Arenas f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3, 16 (5), 757 - 774.

准定位选民群体，带动了选民的广泛参与，极大地增强了竞选效果。^①这也意味着，彼时的信息技术发展已经让政党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单向信息传递迈向了多向互动，为现代政党的数字化竞选奠定了基础。

第二，数据驱动与精准动员阶段。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一阶段的政党开始大规模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积累的海量数据来推动选民动员策略变革。靶向化动员是这一阶段政党政治的核心特征，政党不再依赖宽泛且模糊的平铺式的宣传策略，而是通过社交媒体数据和算法技术直接接触关键选民，极大增强了与选民互动的深度。这一变化深刻体现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Donald Trump）竞选团队充分利用了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与剑桥分析公司合作，他们分析了数百万选民的社交媒体数据，包括他们的点赞、转发、搜索行为，然后为每个群体投放不同版本的广告。比如对于那些支持枪支权利的选民，他们更加容易收到强调“保卫第二修正案”（“Defending the Second Amendment”）的广告；对于那些中间立场的选民，他们更加容易刷到移民安全与合法性的帖子。^②如此一来，能够保障竞选团队最大限度地争取摇摆州选民的支持。类似地，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也采用了相似的靶向策略，支持脱欧的阵营在脸书上花费重金进行定向广告投放，多个广告特意夸大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风险，并且暗示对英国经济造成的潜在压力，由此扩大了脱欧阵营的影响力。^③可见，数据驱动和精准动员模式不仅提升了政党竞选的效率，也极大增强了与选民互动的深度。

第三，平台生态与智能化治理阶段。2020年以来，伴随着平台经济的崛起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政党政治逐步进入了智能化治理阶段。这一阶段的政党开始整合多个数字平台，包括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线上广告、短视频平台等，构建起一个全流域的互动生态。相较于上一个阶段的靶向化特点，这一阶段政党更加关注如何通过线上社群、直播、短视频等形式与选民建立起更紧密的政治联结。在这方面，2024年的美国大选中，候选人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竞选团队采用了多平台的整合策略。利用脸书、照片墙（Instagram）、推特（Twitter，现为“X”）、短视频（TikTok）等不同平台的特性，与选民进行多维度的互动。尤其是为了吸引年轻选民，哈里斯团队还通过各种平台发布有趣和富有创意的政治内容。在智能化治理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在竞选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政党不仅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关注选民行为和情感态度，并在此基础上评估不同政治议题和广告内容的效果；还可以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选情监测，实时跟进选民的态度和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竞选策略。^④总之，平台化和智能化的治理模式，目前仍处在进行时的探索中，未来政党将会更加依赖数据与技术，实现更精细化和实时化的政治动员。

总之，上述三个阶段勾勒了数字化发展之于政党政治的时序性影响，深刻反映了技术驱动下政党政治的演变过程。从早期的单向信息传递与互动探索，到数据驱动的靶向化动员，再到现如今平台生态与智能化治理模式的构建，每个阶段都代表了政党借助新兴技术提升政治沟通、选民动员、政策实施等方面的努力。同时，上述讨论也从侧面表明，“技术中心主义”的视角在理解政党政治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价值。技术不仅是政党政治发展的工具，更是推动政治行为模式、选民关系以及治理变革的核心动因，深刻影响着现代政治的运作方式和治理效果。

三、数字化如何重塑政党政治的结构与秩序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不仅为西方政党提供了更为精细的治理工具，也成为推动政党

① S. G. F. Hughes, et al. "Obama and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and Technology". *The European Business Review*, 2010, 16: 21.

② N. Persily. "The 2016 US Election: Can Democracy Survive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7, 28 (2): 63-76.

③ J. Ker-Lindsay. "Turkey's EU Accession as A Factor in the 2016 Brexit Referendum". *Turkish Studies*, 2018, 19 (1): 1-22.

④ R. A. Chow. "AI's Underwhelming Impact on the 2024 Elections". *Time*, 2024. <https://time.com/7131271/ai-2024-elections/>

革新与竞争策略转型的核心力量。随着技术的深入应用，政党开始逐渐拥抱数据驱动、算法支持的现代竞选生态，通过精准的靶向投放和外部协作模式，最大限度地增强竞选效能。同时，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扩散和互动机制，能够让更多草根力量直接推动政治议程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政治权力格局。这场深刻的变革不仅提升了政党的响应能力，也在全球范围内开启了政治秩序的深刻重组，西方政党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重新审视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

（一）算法驱动的选举竞争新格局

在数字化浪潮下，技术不仅是政党竞争的重要工具，更是塑造政治议程、影响选民投票，甚至重新定义政治权力结构的重要力量。从选举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党总是在适用新的信息沟通技术，并不断调整和优化竞选策略，以提升赢得选举的机会。早期的竞选宣传主要依赖面对面互动、分发宣传资料等方式推动，如上门拉票、张贴竞选广告、广告牌展示等，这种方式虽然能够相对直接地接触选民，但是成本高，影响范围相对有限，且竞选效果很难评估。^① 进入 20 世纪，电视的普及标志着竞选宣传的一次飞跃，政党借助电视广告、竞选辩论等形式，扩大了宣传效应，并通过视听媒体增强了信息传播的感染力和权威性。^② 到了 21 世纪，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崛起，政党的竞选策略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竞选宣传通过数据分析和算法定向将竞选信息推送给目标群体，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和精准度。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2012 年以来，美国大选中对社交媒体依赖度持续增加，油管 and 脸书是两大主要的数字平台。^③ 社交媒体、点对点信息、拉票应用、在线广告等新的信息传播工具在降低政党竞选成本的同时，也打破了既往大党垄断信息媒介的局面，为新兴政党登上竞选舞台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可以说，数字化发展对竞选政治的影响不仅是工具意义上的革新，也在深远地影响和改变着政党竞选的逻辑与运作方式，具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竞选策略的靶向化。数字时代的政党更加依赖数据分析和精准投放技术，根据选民的年龄、性别、地理位置、潜在政治偏好等多维信息，定向推送定制化内容。通过与数据分析公司合作，政党可以根据选民的社交媒体数据对其进行心理画像。^④ 如将用户划分为愤怒的选民（angry voters）、心怀不满的白人男性（resentful white men）、犹豫不决的民主党人（undecided democrats）等类型，为不同类型的选民推送相应的竞选广告，有时甚至会根据选民的偏好捏造虚假的政治新闻，以期实现政党的竞选目的。^⑤ 在 2016 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竞选团队在精准定位和分析目标选民的基础上，通过脸书向摇摆州的特定非裔选民推送“暗贴”——希拉里（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曾称黑人青年是“高级掠食者”，引发了这些群体对希拉里的排斥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共和党成功获选。^⑥ 无独有偶，英国工党（Labour Party）也擅长利用算法辅助政治宣传，在搜索引擎上根据选民画像特征精准推送竞选广告，如向 42—70 岁的女性定向投放改

① A. Chadwick. “Digital Network Repertoires and Organizational Hybridit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07, 24 (3): 283–301.

② C. Edmond.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Coordination, and Regime Chang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3, 80 (4): 1422–1458.

③ A. Perrin, and M. Anderson. “Share of US Adults Using Social Media, Including Facebook, Is Mostly Unchanged Since 2018”.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4/10/share-of-us-adults-using-social-media-including-facebook-is-mostly-unchanged-since-2018>.

④ M. Wintroub. “Sordid Genealogies: A Conjectural History of Cambridge Analytica’s Eugenic Roo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0, 7 (1): 1–16.

⑤ S. C. Matz, et al. “Psychological Targeting a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Digital Mass Persuas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114 (48): 12714–12719.

⑥ I. M. Hegazy.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Neuromarketing 2.0 on Election Outcomes: The Case of Trump’s Presidential Campaign 2016”.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21, 6 (3): 235–251.

革养老金的政策主张，来动员更广泛的选民为其投上宝贵的一票。^① 靶向宣传策略的积极效应得到了大量研究验证，同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实施定向化宣传时，政党也有必要考虑不同平台的异质性，各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群体、行为模式和使用场景存在显著差异，即使是同一平台在不同时间段也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用户偏好。^②

第二，竞选分工的协作化。数字时代，政党的竞选活动并非仅仅由党派内部成员参与，同时存在民意测验专家、广告专家、电视专家等外部参与者。通过整合外部力量，政党能够利用数据和技术建构起更加复杂和动态的数字竞选生态体系。外部参与者通常来自各行各业，例如广告和媒体顾问不仅能够辅助政党制定个性化的营销策略，还可以设计专门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活动方案。再如美国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团队聘用剑桥分析公司的专家技术人员，利用数字技术对线上平台数据与线下选民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为共和党提供优化广告投放、跨平台协作等更为及时和专业的竞选策略支持。^③ 同时，数字技术将碎片化的选民进行了有效整合，成为竞选分工的重要一环。一般来说，政党官方通常会在自己的在线竞选平台上发布信息，注册该平台的用户会收到平台的活动提醒，鼓励用户在自己的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分享这些竞选信息，这些在自己社交媒体上分享竞选信息的用户被称为“放大器”，有效提升了竞选活动的社交媒体曝光率。通过这种方式，竞选团队能够绕过社交媒体平台算法过滤的限制，确保政党信息能够更加广泛地触及更多选民。^④

第三，竞选格局的平衡化。数字技术表面上是竞选工具的革新，但也在静悄悄地调整着政党形态与竞选格局。社交媒体等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打破了传统大党和政治精英的持续控制，削弱了传统媒体对政治议程设置的垄断。^⑤ 尤其是赋予了小型政党、新兴政治力量甚至是个人更多发声机会。著名的法国“黄背心”运动就代表了一种草根化和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他们主要依靠数字媒体进行动员，并提出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诉求，展示了数字技术在打破媒体和政治精英垄断中的潜在优势。在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也凭借社交媒体传播和数字直接民主等策略实现了快速崛起，成为多党制政党格局中的关键一环。^⑥ 同时，政党在利用数字媒介传播政治信息的过程中，也在逐步为社会底层民众，尤其是有色人种提供更多参与渠道，直接促成了代表不同利益的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促成了各政党力量之间的平衡。^⑦ 总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适应了政党力量不断变化的需求，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旧政党势力的削弱，并激励了小政党选择独立竞选或与其他政党结盟。

（二）情绪政治下的动员逻辑转向

近些年来，数字动员成为政党与选民互动的关键方式，通过社交媒体、数字广告和在线活动，政党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接触到潜在的支持者。这种数字动员不仅涉及信息传播和政治宣传，还包括组织开展线上或线下活动，并直接影响选民的行为。相较于传统的动员方式，数字动员

① 马欣茹、李宏：《数字时代英国工党的调适：新形态与新挑战》，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5（2）。

② A. O. Larsson. “Picture-Perfect Populism: Tracing the Rise of European Populist Parties on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 2020, 24 (1): 227 - 245.

③ M. Bossetta. “The Digital Architectures of Social Media: Comparing Political Campaigning on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and Snapchat in the 2016 U. S. Elec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8, 95 (2): 471 - 496.

④ J. Penney. “Social Media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Electoral Promotion: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2016 Bernie Sanders Digital Campaig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 67 (3): 402 - 423.

⑤ S. Meraz. “Using Time Series Analysis to Measure Intermedia Agenda-Setting Influence in Traditional Media and Political Blog Network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1, 88 (1): 176 - 194.

⑥ R. Barbeito Iglesias and Á. Iglesias Alonso. “Political emotions and digital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the new populist parties: the cases of Podemos and Vox in Spa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21, 31 (2): 246 - 267.

⑦ E. Scheiner. “Does Electoral System Reform Work? Electoral System Lessons from Reforms of the 1990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 11 (1): 161 - 181.

的特性使其在当代政党政治中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一是即时性。数字动员能够通过数字媒体等在线平台实现政治信息的快速传播，增强了政党对舆论反应的灵敏性，提升了动员效果，相关研究也表明，政党可以通过这种实时互动方式塑造公众舆论和选举议程。^①二是分散性。数字媒介的发展促进了政治动员由自上而下的权力模式走向去中心化的动员结果。^②传统的政治动员依赖于精英或领导来发动，而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媒体和在线平台的发展使得普通选民和政党支持者能够自主参与动员过程，他们通过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政治态度、转发政治信息等方式推动议题进入公共讨论，扩大了政治影响力。三是广泛性。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政党能够接触到以往难以覆盖的群体，比如社会底层、少数族裔或边缘化群体，由此扩大了选民基础。同时，与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相比，数字动员在具体策略上实现了以下几方面革新：

第一，动员内容趋向视觉呈现。与在传统报纸和门户网站上发布长文的动员方式不同，政党在数字时代更加倾向于通过视觉内容来更有效地吸引选民。政党利用视觉化、简洁的内容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难度，并通过具有情感冲击力的媒介形式吸引那些较少参与传统政治讨论的选民，以此扩大了政党的动员范围。Dimitrova 等人的研究表明，视觉内容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效果更佳，尤其是在面向年轻人和低关注度选民时，简短且视觉吸引力较强的内容能更加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③可见，这种传播模式的转变并非仅仅是为了迎合媒介技术的发展，更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吸引那些年轻选民和网络活跃用户，这些群体往往倾向于通过碎片化的信息进行快速消费，而诸如表情包、短视频等工具不仅易于传播，还能激发选民的情感共鸣。^④例如英国脱欧中的表情包“wall of gammon”利用讽刺和幽默的手段吸引特定选民群体，增强了政治信息的传播力和社会讨论度。^⑤再如特朗普的“推特策略”，就是通过可视化与简化的信息传播形式，结合个性化和富有争议性的语言，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成功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

第二，动员方式凸显个人魅力权威。现代政党在进行数字动员中，越来越倾向于借助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和情感投资来吸引选民。韦伯的经典理论指出，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者因为拥有民众所渴望的特质或独特吸引力，通常能够有效动员大众。^⑥在数字化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政党的动员策略逐渐由政党的整体形象转向政党领袖的个人形象，选民往往能从娱乐化叙事中对喜爱的政治人物进行情感投资，这种趋势使得政党将流行文化元素融入政治动员中。近些年美国大选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都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宣传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上，试图用个人化的形象来吸引选民。^⑦有研究表明，特朗普在真人秀节目《学徒》（The Apprentice）中成功塑造了“胜任领导者”的形象，增强了观众对其的信任感，成功将节目收视率转化为初选阶段的选票支持。^⑧当然，政党的这种营销策略也使得候选人经常成为对方攻击的焦点，但这样的攻击对于一些政党来说并非坏事，这种政党之间的相互攻击反而能引起更多选民的关注，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到政

① D. Kreiss. "Seizing the Moment: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s' Use of Twitter During the 2012 Electoral Cycle". *New Media & Society*, 2016, 18 (8): 1473 - 1490.

② Z. Papacharissi. *Affective Publics: Sentimen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69 - 73.

③ D. V. Dimitrova, and J. Matthes. "Social Media in Political Campaigning Around the World: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8, 95 (2): 333 - 342.

④ A. D. Segesten, and M. Bossetta. "A Typology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line: How Citizens Used Twitter to Mobilize During the 2015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6, 20 (11): 1625 - 1643.

⑤ J. Dean. "Sorted for Memes and GIFs: Visual Media and Everyday Digital Politics".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18, 17 (3): 255 - 266.

⑥ M.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1111 - 1158.

⑦ J. Katz, and D. Halpern. "Political and Developmental Correlates of Social Media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A Global Survey of National Leadership Websi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3, 36 (1): 1 - 15.

⑧ E. Kim and S. Patterson Jr "The American View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ntertainment Med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25, 119 (2): 917 - 931.

治活动中，成为获取选民支持的重要契机。^①

第三，动员活动呈现营销化趋势。在社交媒体推广和数字竞选的背景下，政党的动员活动展现出一定的营销化特征。这种营销特征主要表现在，政党经常会利用商业营销手法，将政治活动包装成面向公众的产品，通过策略性的宣传和推广方式，吸引碎片化选民的关注。首先，政党动员倾向于运用公民营销，将狂热的支持者当作信息传播的渠道。2015年的英国大选中，保守党聘请奥巴马团队顾问 Jim Messina 负责公民营销，将热情的支持者作为政党信息传递的点对点渠道，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约束支持者进入在线信息渠道，将支持者个人的媒介推广汇总成了政党病毒式的营销策略。有学者将这种营销模式归纳为“受控互动”（controlled interactivity），虽然没有赋予支持者实际的发言权，但可以利用支持者的热情来达到政党的动员目的。^②其次，公民营销包含了个性化与非正式表达。公民营销中包含更多个性化的、以幽默和流行文化为导向的内容，相较于政党官方正式严格的内容审核，公民个人的非正式表达成了政党营销的有生力量。^③当然，公民个人非正式表达也存在行为失范和道德问题等潜在风险，这种具有争议的内容和行为反而可能会成为政党动员活动的绊脚石。^④最后，政党在动员活动中的市场化特征还体现为平台算法的深度应用。政党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社会动员的帖子会受到平台算法的影响，当政党的数字动员策略初见成效之际，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便会将其推送给更多用户，从而提高政党动员的关注度。^⑤

（三）政治互动中的政民关系再调整

上节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数字动员”的逻辑，即政党如何通过数字媒体手段实现对公众的动员，重点在于单向度的政治传播行为，特别是视觉元素的设计、情绪话语的塑造以及媒介节奏的操控，如何增强政党话语的可见性与情感穿透力。然而，数字传播并不仅止于动员一端。正是在动员行为的基础上，政党与公众之间逐步形成了更为复杂的互动网络。因此，本节转向“政治互动”的维度，着重探讨在数字平台所营造的互动性结构中，信息如何被扩散、公众如何参与，以及政党如何通过回应、议题设置和关系建构来深化其与选民之间的联系。简言之，如果说前一部分强调的是政党如何发声，本部分则关注其如何倾听与对话。数字技术对政党政治的影响不仅限于政见传递和政治动员，还深刻地重塑着民众与政党间的交流互动方式。一方面，数字平台拉近了政党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直接沟通渠道，由此增强了选民的政治参与感，赋予了普通民众塑造议程的力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发挥了“扩音器效应”，个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诉求不再局限于小范围讨论，而是能够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之于政治互动的影响，还深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民互动日益频繁。政党在数字时代的互动方式不同于传统低效的面对面直接交谈，而是转向一种更具即时性、广泛性和更高效率的数字互动，不仅提升了政党和民众沟通交流的效率，更提高了民众对政党的支持率和满意度。从互动的模式上来看，一方面政党积极建设和完善自己的

① M. A. Xenos, T. Macafee, and A. Pole. "Understanding Variations in User Response to Social Media Campaigns: A Study of Facebook Posts in the 2010 US Elections". *New Media & Society*, 2015, 19 (6): 826 - 842.

② A. Chadwick, and J. Stromer-Galley. "Digital Media, Power, and Democracy in Parties and Election Campaign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16, 21 (3): 283 - 293.

③ J. G. Blumler. "The Fourth Ag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ques De Communication*, 2016, 6 (1): 19 - 30.

④ J. Penney. "Social Media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Electoral Promotion: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2016 Bernie Sanders Digital Campaig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 67 (3): 402 - 423.

⑤ M. Bossetta. "The Digital Architectures of Social Media: Comparing Political Campaigning on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and Snapchat in the 2016 U. S. Elec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8, 95 (2): 471 - 496.

门户网站，并增设了民众留言的新版块，^①从既有的单向政治信息传播转变为双向的政治交流互动；另一方面，政党也在精心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尤其是“五星运动”（Movimento 5 Stelle）等建立在数字媒介之上的新兴政党，将数字平台视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并聘请专业的运营团队来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以期能够及时回应社交媒体上用户的留言和反馈，从而塑造倾听支持者呼声的亲民形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利用脸书、推特、照片墙等平台，在传递自身政治信息的同时也在通过这些平台回答问题、收集意见和反馈，从而保持和民众的沟通和互动。人民行动党通过数字互动有效回应了选民的疑虑，进而扩大了自身的执政资源。^②同时，记者作为数字传播的把关人，成为政党社交媒体策略的重要靶点。政党发布的社交媒体内容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记者的新闻报道，还通过报道的复现，悄然渗透到公众的视野中。^③在这个过程中，民众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的评论区表达观点，进一步促成了与政党的间接互动。

第二，参与机会日渐广泛。线上政治参与已成为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途径。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以及政党引导下，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规模不断扩大，领域持续拓展，覆盖范围日益广泛，参与效能也显著提升。在参与规模上，政党综合使用电子邮件发放、定向投放广告、社交媒体互动等多种手段，呼吁和动员更多政治冷漠群体参与到投票、筹款等政治活动中，有效地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规模。^④在参与领域上，民众参与政党政治的活动类型更加丰富多样，不仅有政党主动号召下的选举投票和筹措资金，还包括自身主动参与的意见表达和社会运动。来自韩国的证据表明，社交媒体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交互式的政治参与环境，不仅为分散在各地的民众提供了共同参与社会运动的桥梁，也显著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意愿。^⑤在参与范围上，数字媒介中谈论的话题不仅是本国本地区的政治话题，远在美国的推特用户也可以对俄乌冲突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从而催生了更广泛的跨国政治参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介显著地提升了跨国界的政治参与率。^⑥在参与效能上，以“五星运动”为代表的数字化政党主动开辟数字平台，弥补了委托代理模式的民主缺陷，让内部成员和外部支持者直接参与党内事务决策。^⑦同时，普通民众可以通过数字扩音器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从而汇聚起影响政党政策，甚至是重塑政党形态的强大力量。^⑧

第三，草根政治日趋活跃。在传统的政党政治生态中，草根阶层较少有机会参与政治，由此沦为政治冷漠群体。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这些原本疏离政治的草根阶层逐渐获得了表达和参与的机会，重新融入政治进程。近些年来，数字参与已经逐渐成为草根阶层参与政治的方式，^⑨相关研究表明，数字媒介和平台不仅促进了草根阶层的线上参与，还提升他们线下参与政治活动的可

① L. Zheng, and T. Zheng. "Innovation Through Social Media in the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and Interaction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4, 31: S106 - S117.

② 孙会岩：《数字化治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引领国家现代化的技术、组织与价值》，载《太平洋学报》，2023（9）。

③ J. H. Parmelee. "The Agenda-Building Function of Political Tweets". *New Media & Society*, 2013, 16 (3): 434 - 450.

④ R. Borge, et 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Digital Technology Era: A Symposium on *Outside the Bubble: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Ital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22, 53 (2): 273 - 291.

⑤ H. Hwang, and K. Kim. "Social Media as a Tool for Social Movements: The Effect of Social Media Use and Social Capital on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Move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2015, 39 (5): 478 - 488.

⑥ D. Kuznetsova, and C. J. Tolbert. "Globalizing Information Networks, Social Media, and Participatio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23, 104 (4): 505 - 520.

⑦ 方彪、张鹏：《政党的“计算”抑或“算计”的政党：技术革命驱动西方政党政治发展新图式》，载《比较政治学研究》，2024（1）。

⑧ A. Calderaro, and A. Kavada. "Special Issue on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cy Change'". *Policy & Internet*, 2013, 5 (1): 1 - 6.

⑨ Y. Theocharis, et al. "Digitally Networked Participation and Lifestyle Politics as New Mod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cy & Internet*, 2019, 13 (1): 30 - 53.

能性。^① 2016年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竞选运动通过“政治革命”的主题,广泛吸引了草根阶层的支持,这意味着数字媒体打破了传统政治精英主导的政治空间,催生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传播新形式,促成了更加平等的政治参与环境。^② 草根阶层在通过数字媒体传播和分享见解的过程中,不仅为各种政治信息的流动贡献了力量,还在挑战并塑造着传统精英主导的政治议程。^③ 2018年3月,不满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种族主义框架的德国草根群体自发组织起来,通过线下“打破”边境巴士巡游和线上舆论施压等手段,迫使德国主流政党在移民政策上收敛极端倾向,并提出了替代性的解决方案。^④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草根阶层的非正式表达也可能因缺乏结构性支持而受到限制,更会因为非理性参与而深陷情绪化的讨论,片面放大极端意识形态,导致公共讨论的失焦和政治极化。

(四) 数据治理中的政策制定机制

在数字时代,政党政策制定愈发注重数据和数据的潜在价值,并借助算法和信息处理技术来读取和分析数据中潜在政治话语,从而更加有效地应对执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与传统的政策过程相比,政党通过算法驱动的数字技术辅助公共政策的制定,在当今政治活动中展现出显著优势。它不仅能够提升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大幅增强了政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加精准地回应复杂的社会需求和形势变化。^⑤ 从政策过程视角来看,数字时代政党政策制定过程实现了如图1所示的几个方面的转型:

第一,数字网络引领下的信息获取。相较于传统的民意调查,数字时代政党经常会借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收集社会舆论偏好信息,这不仅提高了政党获取信息的广度,也大幅度降低了时间和经济成本。具体而言,政党依赖数字网络获取信息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政党运营的数字媒体。英国工党搭建起“数字工党”平台,通过在线问卷、意见之窗等程序直接收集选民意见;而更多的政党则选择在自己运营的数字媒体平台上提出特定的社会问题或政策方向,并向民众征求相关的信息、知识、意见和想法,通过ICT、API等平台技术,将社交媒体中讨论的相关内容自动检索出来以便后续进一步分析。^⑥ 二是民众发起的电子请愿。用户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来直接表达政治诉求,这些电子请愿内容、规模以及请愿者的社会特征,不仅能够反映公众的政治偏好,还构成了未经删选的信息储备库。三是意见领袖的政策见解。经验丰富的记者和专家往往是一部分民众的意见领袖,他们习惯于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通过捕捉意见领袖的政治信息,可以高效便捷地评估公民对现有政策的态度并识别社会感知的相关话题。当然,在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便利的同时,政党也需要从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中甄别出可用于政策制定的有效信息,这也对政党的数字素养和甄别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二,数字媒介支持下的议程设定。政党通过数字媒介的付费推广和话题标签等策略,打破了算法壁垒和“过滤气泡”的限制,使其政治主张能够在更广泛的社会面上传播,并精准控制特定帖

① B. Bimber, et al. “Digital Media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olitical Interest Across Acts and Over Time”.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15, 33 (1): 21 - 42.

② C. Kim, and S. Lee. “Does Social Media Type Matter to Politics? Investigating the Difference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epending on Preferred Social Media Sit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21, 102 (6): 2942 - 2954.

③ H. Jenkins, et al. *Spreadable Media: Creating Value and Meaning in a Networked Culture*. NYU Press, 2014, pp: 153 - 160.

④ M. Perolini “Challenging oppression: how grassroots anti-racism in Berlin breaks border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22, 45 (8): 1475 - 1494.

⑤ 王锐、倪星:《数字监督与国家信息能力的建构——基于294个数字监督实践案例的分析》,载《理论与改革》,2024(5)。

⑥ A. Cordella, and C. M. Bonina. “A Public Value Perspective for ICT Enabled Public Sector Reforms: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2, 29 (4): 512 - 520.

子的受众范围。^① 相较于传统的议程设置方式，政党依托数字媒介设定政策议程的过程主要有三方面优势：其一，数字媒介提高了政策议程的响应速度和精准度。政党一方面可以使用数字媒介快速地采取行动，随时关注社交媒体上的不当言论，及时阻止虚假信息的传播；^② 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汇总并分析公民的政策偏好和需求，并据此设计与公民偏好密切相关的政策。^③ 其二，数字媒介增强了政策议程的民主合法性。依托数字媒介，政党可以和公共部门以外的普通民众、媒体记者等政策参与者进行沟通互动，为其提供政见表达和信息反馈的渠道，从而减少对技术专家的依赖，强化政策议程的合法性。^④ 对于“我们能”党和“呼声”党（Vox）等数字化政党而言，数字平台中的直接沟通和深度参与不仅是动员选民的关键策略，更是其塑造合法性根基、实现成功崛起的关键一招。其三，数字媒介强化了政党在政策议程中的问责机制。政党在与公民持续互动的过程中，不仅增进了双向的信任和理解，还促使政党不断自我修正，推动公共政策朝着更具社会责任的方向发展。^⑤

第三，算法模型驱动下的政策制定。政党在设定政策议程之后，后续关键的一步是如何从庞大的数据集和信息流中提取出有价值的政治信息，并通过算法模型进行分类和分析，最终转化为政策制定的核心依据。^⑥ 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相关的实践，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时，德国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ündnis Sahra Wagenknecht）通过算法模型推断出移民政策并非选民的核心关切，策略性地提出了教育和养老等关乎民生的政策主张，成功赢得了选民的大力支持。^⑦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政策模型背后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深度耦合，解决政策问题不仅依赖单一学科的知识，还需要各个领域专家的共同参与，以此形成政策共同体。在此意义上，欧盟资助的 eGovPoliNet 项目成为跨学科合作的典型案例，该项目汇聚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学科的从业者和研究人员，他们通过建立系统化的知识库和政策语料库，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可靠的数据证据，还为各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供了“晴雨表”。^⑧ 更重要的是，该项目还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模型算法的“黑匣子”，通过跨学科专家的合作，避免了对技术的盲目依赖。^⑨

四、数字化冲击：利益博弈中的合法性流失与治理裂痕

数字化浪潮正在深刻影响着西方政党的合法性和治理能力。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和政治动员的方式，也在根本上重塑着利益博弈的逻辑。因此，本节我们尤其关注，数字化如何作为一种外部变量，持续撼动着政党体制赖以维系的三大支柱：价值整合、权威建构与代表功能。基于

① D. Lazer. “The Rise of the Social Algorithm”. *Science*, 2015, 348 (6239): 1090–1091.

② M. Maciejewski. “To Do More, Better, Faster and More Cheaply: Using Big Data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6, 83 (1): 120–135.

③ A. Clarke, and H. Margetts. “Governments and Citizens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Open, Closed, and Big Data in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Policy & Internet*, 2014, 6 (4): 393–417.

④ L. A. Schintler, and R. Kulkarni. “Big Data for Policy Analysis: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2014, 31 (4): 343–348.

⑤ A. Clarke, and H. Margetts. “Governments and Citizens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Open, Closed, and Big Data in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Policy & Internet*, 2014, 6 (4): 393–417.

⑥ M. Maciejewski. “To Do More, Better, Faster and More Cheaply: Using Big Data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6, 83 (1): 120–135.

⑦ 郑春荣、江昀蔚：《欧洲左翼保守主义政党的崛起与发展——以德国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为例》，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04）。

⑧ L. Brooks, et al. “eGovPoliNet: Experiences from Building a Policy Informatics Research Community”. In J. R. Gil-Garcia, T. A. Pardo, L. F. Luna-Reyes (eds.). *Policy Analytics, Modelling, And Informatics*. Springer, 2017: 39–75.

⑨ J. Burrell. “How the Machine ‘Thinks’: Understanding Opacity in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Big Data & Society*, 2016, 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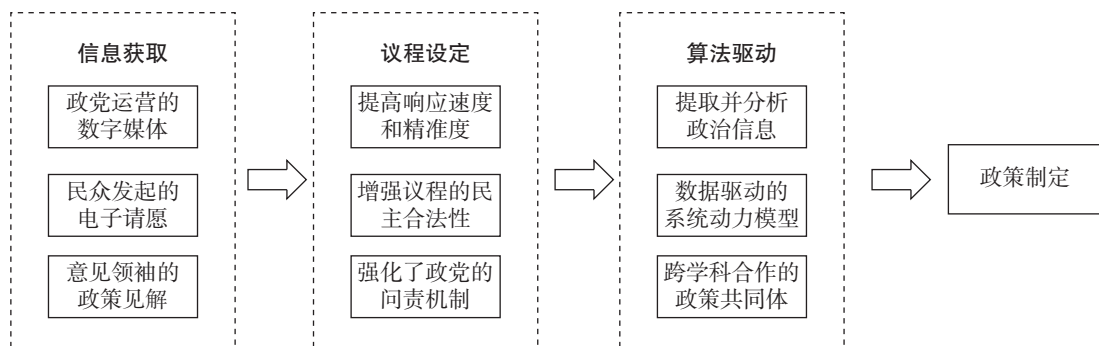


图1 政策制定的内在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拟。

此，我们试图从三个相对独立但彼此关联的维度呈现其影响机制：第一，政治话语层面的撕裂，表现为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情绪的加速蔓延；第二，信任机制的失焦，尤其是媒体逻辑的反向嵌入如何削弱了政党的公共形象与治理信誉；第三，制度中介功能的日益疏离，即政党在数字参与结构中逐渐丧失其作为民意整合者与责任传递者的枢纽角色。其中，信息的低门槛传播为民粹主义和极化情绪提供了土壤，造成了话语撕裂的局面。数字媒介的透明效应使得政党内部权力博弈和利益分配公开化，公众对政治精英的分肥行为日益不满，引发信任的失焦。同时，数字参与形式削弱了政党作为民意代理的传统角色，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特征动摇了政党的主导性权威，令民意和代表性逐渐疏离。也是在这样意义上，数字技术的兴起既是政治变革的工具，也是治理裂痕的催化剂。

（一）话语的撕裂：民粹浪潮中的极化危机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兴起，一场全新的价值革命也悄然展开。数字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信息传播和消费的门槛，动摇了传统建制派对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成为全球范围内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助推器。作为一种“稀薄的意识形态”（thin-centered ideology），民粹主义通常将“为人民代言”“反建制”“反精英”作为政治宣言，从而吸引广泛的选民支持，激发公众的情绪。^①同时，这种“稀薄性”特征恰恰与数字媒体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完美契合。^②民粹主义政党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化特性和算法推荐机制，进一步放大了民粹主义的声量，形成信息茧房，加剧了社会的极化和对立。例如，民粹主义者使用社交媒体和算法技术塑造了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等政治事件。^③可以说，“数字民粹”的出现，加剧了政治话语场域的撕裂和社会认同的极化危机，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技术变革塑造了民粹主义的制度土壤。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它使民粹主义政党找到了更加有效的传播方式和动员机制，催生了经济受挫的群体，也改变了全球政治版图的格局，加剧了社会的对立和极化。在经济上，数字化浪潮造成了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大批工薪阶层深感经济不再稳固，焦虑和不安使得他们更加倾向于支持那些振奋人心的民粹极端主张。^④2022年瑞典议会选举中，近半数的工人阶层选民放弃了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转而支持极端的右翼民主党。^⑤同时，在政治上，数字化打破了传统的权力结构，代议制民主日益形式化，

① C.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4, 39 (4): 541 - 563.

② B. Stanley. “The Thin Ideology of Popu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08, 13 (1): 95 - 110.

③ C. Wells, et al. “How Trump Drove Coverage to the Nomination: Hybrid Media Campaign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16, 33 (4): 669 - 676.

④ Z. J. Im, et al. “The ‘Losers of Automation’: A Reservoir of Votes for the Radical Right?”. *Research & Politics*, 2019, 6 (1): 1 - 10.

⑤ B. Rothstein. “The Shadow of the Swedish Right”. *Journal of Democracy*, 2023, 34 (1): 36 - 49.

建制派政党分肥的腐败问题直接暴露在公众视野中。^① 在西班牙，“我们能”党抓住国家法院审理人民党（Partido Popular）首相腐败案件的契机，利用数字媒体与选民进行去中介化的沟通，极力谴责建制党的腐败以及代议机构的合法性，以简化的叙事和情绪化的语言拉拢了大量对政治精英失望的普通选民。

第二，媒介逻辑催化了政治极化的传播链条。一般而言，普通民众天然对简化、情绪化的信息更加感兴趣，而那些严肃的政治讨论往往会被大众化的浪潮所淹没。随着数字媒体的普及，这一趋势愈发明显。复杂的政治议题经常会被简化为片段式的口号，民众的政治态度也会变得肤浅和情绪化。唯其如此，这种信息环境为政治极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算法机制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极化趋势。一方面，数字媒体平台无形中建构了信息茧房，用户越来越多地接触的是与自身立场相适的观点，屏蔽了不同的声音。^② 这种单向的信息输入实际上巩固了既有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政党巧妙利用数字媒体的这种离散化特点，刻意传播情绪化、对立性的政治叙事，导致了社会共识的瓦解和公共领域对话的失败。^③ 同时，区块链等技术的匿名性和加密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极化危机，成为滋生“海盗”党（Pirate Party）等极端主义政党的温床。

第三，策略实践放大了民粹政党的权力动能。数字化转型促使民粹主义政党迅速崛起，民粹主义政党通常将自己塑造成“人民的代言人”，营造出亲民且代表民意的形象，并且借助数字平台打造“网红领袖”，^④ 宣扬“人民”和“精英”之间的二元对立，激化普通民众对传统政党的仇视，从而团结和凝聚更多的摇摆力量。然而，这种通过二元对立激化社会情绪的策略，削弱了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也以简单的叙事策略掩盖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导致了政策讨论情绪化和极端化。^⑤ 长此以往，民众对传统机构的信任程度持续性下降，导致民主制度中的协商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政党合作愈发困难，国家和社会关系愈发紧张，政治僵局频发。当然，数字化并未必然引向政党民粹化，但它确实深刻改变了政党之间的竞争逻辑与沟通模式，从而为民粹政治话语的扩张提供了更具优势的土壤。

（二）信任的失焦：数字媒介中的形象裂痕

数字党争引发民众不满。当前西方国家党派纷争逐步蔓延到数字平台，激烈的党争不仅削弱了议事效率，甚至使政党政治的正常运转陷入危机。在美国大选期间，民主党和共和党频繁使用网络机器人和僵尸账号来操控舆论，散布误导信息，试图通过削弱对手的公信力来为自身谋利。例如，共和党捏造“奥巴马医改计划含‘死亡小组’（Death Panels）”的谣言，民主党同样散布“布什政府协助制造 911 恐怖袭击”等阴谋论。^⑥ 虽然这些虚假新闻可以短暂激发公众的热情，但频繁使用不仅会威胁既有的政治秩序，也会引发民众的不满情绪。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崇尚“推特治国”，滥用“否决政治”，将政治协商的平台变成两党极化的竞争战场。这种操作将政策制定和议题讨论转化为争夺舆论关注的表演，民主的核心诉求反而被忽视。

^① S. Engler. “‘Fighting Corruption’ or ‘Fighting the Corrupt Elite’? Politicizing Corruption Within and Beyond the Populist Divide”. *Democratization*, 2020, 27 (4): 643-661.

^② L. De Nadal. “Populism and Plebiscitarianism 2.0: How Podemos Used Digital Platforms for Organiz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New Media & Society*, 2021, 25 (11): 2961-2980.

^③ M. Conrad. “Post-Truth Politics, Digital Media,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2021, 9 (3): 301-311.

^④ K. Jacobs, and N. Spierings. “A Populist Paradise? Examining Populists’ Twitter Adoption and Us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8, 22 (12): 1681-1696.

^⑤ S. Berman. “The Causes of Populism in the Wes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0, 24 (1): 71-88.

^⑥ D L. Kriner and A. Reeves “Responsive Partisanship: Public Support for the Clinton and Obama Health Care Plans”. *Journal of Health Politics, Policy and Law*, 2014, 39 (4): 717-749.

信息失控带来信任裂痕。数字时代的媒体环境正在向混合媒体系统转变，政治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变革，这也意味着政党正面临着信息传播控制权下降等挑战。一方面，数字媒介让政党政治活动“暴露在阳光下”，分享公职战利品的政治卡特尔（political cartels）现象受到许多公民的批判，网络舆论和社交媒体强化了公众对于政党分肥的负面看法，也放大了公众预期的绩效结果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降低了公众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度。^①另一方面，在数字平台中，争取公众注意力这一赛道存在激烈的竞争。眼花缭乱的消息和声音削弱了传统政治精英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被操纵的网络舆论也产生和传播了大量不实信息，加剧社会矛盾和对立，当前政党难以应对网络空间的虚假和极端言论，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政党的信任。^②

媒体逻辑虚化政党形象。面对数字时代的形象和信任危机，许多政党希冀通过数字媒介来弥合信任裂痕，但迎合数字媒体逻辑的政治娱乐化倾向也让政党形象趋向肤浅和虚化。^③为了适应新媒体的传播节奏，政党纷纷调整组织架构，从原有的垂直体系向点对点和扁平化方向发展，并推出诸多移动应用来传播政治信息，动员民众。这也使得政党组织关系和对外形象更加复杂，呈现出“虚象化”的趋势。对于“海盗”党等无实体组织的新兴政党而言，这种结构虚化的问题尤为严重。为了吸引民众的注意力，政党开始尝试将政治事件进行娱乐化处理，并炒作针对政党领袖的绯闻，以期制造短期内“政治活跃”的假象。尽管这种方式带来了关注和流量，但削弱了政党政治应有的严肃性和公共使命，使其逐步成为娱乐的附庸。^④

（三）民意的疏离：数字参与中的代表迷失

数字政治参与冲击代理效应。新技术在拓展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也削弱了政党代表民意和表达意见的中介代理效应。^⑤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公民在意见表达上不再依赖政党作为唯一的传声筒，而是通过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直接向政府和公众发声，传统政党组织在整合和反映公众意愿方面逐渐失去主导地位。英国足球运动员马库斯·拉什福德（Marcus Rashford）直接在推特上表达“#HolidaysWithoutHunger”的诉求，说服政府在假期期间为儿童提供免费学校膳食。^⑥同时，在政治选举上，更广泛的公民掌握了数字政治参与的技能，他们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在线投票方式参与政治，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挑战了自上而下的竞选方式，也让政党中介代理角色的合法性受到质疑。^⑦

网络社会运动动摇政党根基。社交媒体和网络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舞台，让普通民众从观众转变为主角，能够自主发起、组织并动员公众参与政治行动。出于对建制派和政治精英的不信任，一些公众开始通过社交媒体自发地发起政治运动，2021年1月，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号召群众行动，最终导致了冲击国会大厦的事件。^⑧同时，网络社会运动因其去中心化的特征，使得公民自发组织的微小行动也能迅速蔓延并在现实中激起巨大反响。这种去中心化的动员方式实

① P. Norris, *Democratic Deficit: 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2 P217-218 P239-240.

② S. C. Craig, and J. Gainous. "To Vote or Not to Vote? Fake News, Voter Fraud, and Support for Postponing the 2020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Politics & Policy*, 2024, 52 (1): 33-50.

③ K. Gattermann, et al. "Who Won the Election? Explaining News Coverage of Election Results in Multi-Party System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21, 61 (4): 857-877.

④ J. P. Jones. *Entertaining Politics: New Political Television and Civic Culture*.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05, pp: 141-160.

⑤ P. Gerbaudo, *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 Pluto Press, 2019, pp: 81-92.

⑥ H. Margetts, and P. John. "How Rediscovering Nodality Can Improve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a Digital World".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4, 102 (3): 969-983.

⑦ R. K. Gibson. "Party Change, Social Media and the Rise of 'Citizen-Initiated' Campaigning". *Party Politics*, 2013, 21 (2): 183-197.

⑧ D. Dave, D. McNichols, and J. J. Sabia. "Political Violence, Risk Aversion, and Population Health: Evidence from the US Capitol Riot".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22, 35 (4): 1345-1384.

际上也在消解着政党的主导地位，逐渐模糊了政治参与的边界。政党不再是唯一能够集结群众的权威性机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分散的、由个体和小群体发起的社会性力量。^①

代议制民主的弊端持续发酵。原本旨在代表民意的代议制民主，如今却越来越偏向维持政治精英的既得利益，渐渐背离了回应普通民众需求的初衷。当前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深陷于“政治正确”的泥潭，将诸如种族、性别等社会问题过度政治化，然而对民众的实际需求却置若罔闻，西方代议制代表民意的功能逐渐流于形式。^② 2024年美国大选中，真正关乎民意的关税、财政、移民等问题被网红松鼠“花生”之死夺走了注意力，民众的利益诉求被媒体流量所淹没，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在逐渐迷失。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政党试图通过数字媒介和技术手段进行调适。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技术层面的努力往往使政党被算法驱动的技术力量所裹挟，逐渐呈现出技术官僚化的趋势，反而使得政党的基础性角色被边缘化。同时，有些政党为了迎合数字民粹主义，走向了所谓的“技术全民公投”主义，过度推崇线上民意的即时表达，而忽略了代议制民主所需的理性平衡和长远视角。^③

五、结语

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政党政治的结构再造与秩序变革似乎正走向一种民主僵局。在政党政治数字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见证了数字化政党是如何运用前沿技术一步一步实现从点对点的数字互动探索，到数据驱动的精准动员，再到当下平台生态中的智能化治理的飞跃；又是如何在使用数字技术之时反被技术所裹挟，以至于撕裂了原有的政党政治文化基础，在数字浪潮中逐步丧失了代表性和选民的信任。在竞选革命和数字动员的政治沟通策略转型中，数字化政党巧妙地抓住了数字媒介，策略性地将政治宣传的阵地转移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中，借助视觉传播和情感共鸣等政治沟通策略，有效提升了宣传的精准性和动员的广泛性，成为数字化政党赢得选民支持进而上台执政的催化剂。同时，数字化政党借助媒介平台和大数据算法，将政治互动的舞台搬到数字媒体之上，不仅点燃了既往政治冷漠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拓宽了政治互动的范围，提高了政治互动的频率，也从政治互动中汲取了更为广泛和真实的社情民意，为制定更具代表性和科学性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现实基础。

然而，数字化政党的政策制定和算法治理看似可以更为精准地回应社会形势变化，却忽视了算法背后可能带来的偏颇和极化，也将那些难以变成一串串冰冷数字的复杂社会需求排除在政策制定的考虑范围之外。数字政治参与虽然扩大了政党的政治基础，却也给广泛草根群体带来了崛起的机遇，他们无需通过政党便可自行塑造政治议程，在挑战政党的政治权威性和民意代表性的同时，也带来了非理性的政治讨论和公共问题的失焦。数字动员策略虽然可以帮助政党覆盖更广泛的群体，但动员的主体、内容和方式都在有意迎合媒体逻辑，致使政党政治失去既有的严肃性和规范性，逐步走向政治娱乐化和政党形象虚化的深渊。数字化竞选策略的变革虽然提升了政党的竞选效率，但数字技术也赋能了新兴政党的崛起，并给建制派带来沉重冲击，让政党政治的力量格局更加平衡的同时，也让数字媒介中的党争愈演愈烈，带来虚假新闻、政治极化等新的问题。凡此种种秩序变革，最终未能形成合力提升政党政治的治理效能，却反过来加剧了党派间的纷争和公民对政党的信任危机。从民粹主义浪潮中的政治极化危机，到数字平台中的政治信任裂痕，再到数字参与中的代

① P. Gerbaudo. *Tweets and the Streets: Soci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Activism*. Pluto Press, 2012, pp: 48-75.

② P. Norri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Defici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97, 32 (2): 273-282.

③ N. Silagadze, and S. Gherghina. "When Who and How Matter: Explaining the Success of Referendums in Europe".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2017, 16 (5): 905-922.

表性迷失，利益博弈中的数字化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和治理裂痕。

可见，在政党政治的数字化转型中，虽然政党在自身结构和对外策略上都呈现出崭新形态，但似乎并未在发挥代议制民主作用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政党消亡”和“去政党化”的思潮正悄然兴起。究其原因，数字化政党转型的内在动力仍是为了维护和扩张政治精英的利益，并未触及更深层次的政治结构。代议制民主下的政党政治并未有效发挥代表民意的作用，现行政治体制难以实现政党意志与公民意志的有机统一。为了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建制派精英们往往更关注能带来更多流量和讨论的社会议题，刻意将社会议题政治化，却忽视了真正应该解决和处理的就业、就医等民生问题。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动机，数字化政党的转型似乎偏离了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和民众的真实诉求，而是为了迎合媒体的焦点和网民的喜好，虽然数字化转型能够迅速推进和扩展，但缺乏长远的眼光和更为全面的评估，结果往往是只顾及当下的和表面的利益，而非真正基于整个政治结构和国家长期发展需要的深度考量。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Parties: Technology-Driven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Mobilization Strategies

WANG Xiang, LI Zhiheng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Glob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s and power structures of political parties. Western political parties have evolved from the initial phase of one-way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o data-driven precision mobilization and are now advancing toward platform-based and intelligent governance models. The digital wave has transformed the strategies of electoral campaigns, voter mobilization, and policy-making, enabling political parties to achieve preci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efficient policy responses through data-driven approaches and algorithmic support. However, while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enhanced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t has also brought about the rise of populism, intensified social polarization, and deepened trust crises, posing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the legitimacy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of Western political parties. How to leverage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construct governance models that are more legitimate and inclusive remains a critical issu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party politics.

Key words: Western political parties; Digitaliz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mobilization